

水滸瑣議

王曉家 著

1
山东文艺出版社

水 浒 琐 议

王晓家 著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插图 296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29—0587—X

I·517 定价：5.65 元

目 录

上篇 《水浒传》与文化意识

- 一、从儒、道、释文化意识的流变概观谈起..... 3
- 二、“仁者爱人”是儒家文化意识在《水浒传》中的
演绎.....17
- 三、天理、天命与“天人合一”在《水浒传》中的表
现.....23
- 四、“去邪归正”说表现了《水浒传》的儒家正统观
念.....26
- 五、《水浒传》与“忠义两全”和“纲常不灭”的一
致性.....30
- 六、《水浒传》中的妇女观是封建意识的派生物.....35
- 七、宋明理学与元末明初文化意识变迁对《水浒传》
的影响.....40
- 八、《水浒传》“大小有等”观念是儒家“理一分殊”
文化意识的体现.....43
- 九、《水浒传》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体现了
儒家“无对”说文化观念.....47
- 十、金圣叹评点《水浒》对“八方共域，异姓一家”
观念的变更.....50
- 十一、“天道循环”论为《水浒传》提供了儒家思想
的哲学基础.....55
- 十二、“儒法杂揉”汇合意识对《水浒传》的影响.....63

十三、对道教文化意识的褒扬·····	83
十四、对佛教文化意识的贬斥·····	90
十五、扬道贬佛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根源·····	97
十六、元代杂剧中的“水浒戏”对《水浒传》的影响·····	109
十七、儒、道、释“三教同源”是对《水浒传》的最 终形像图解·····	114

中篇 由此谈及民族意识

一、儒、道是《水浒传》民族意识的思想来源·····	119
二、宋江等人接受北宋王朝招安的积极意义·····	124
三、宋江等人接受北宋王朝招安的主观意图和客观 效果·····	134
四、征大辽与打方腊孰先孰后? ·····	137
五、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积极意义·····	142
六、菊花会上斗争的本质·····	148
七、由“替天行道”到“顺天”“护国”说明了 什么? ·····	151
八、“奴才”高俅与英雄宋江不能相提并论·····	159
九、晁盖的“归天及早”是为了宋江的“把寨为头”·····	167
十、“反诗”不反，深意存焉·····	171
十一、“受天文”用心良苦·····	174
十二、九天玄女娘娘的宗旨意在言外·····	176
十三、关于“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180
十四、关于“茜红巾”与“绣纳袄”·····	184
十五、从民族意识谈及作者的思想衍变·····	190
十六、作者的乡土观念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作用·····	192
十七、由“大刀关胜”谈及民族意识·····	194

下篇 本事、原型与影响

一、《水浒传》的本事来源与宋、元时代特点	201
二、《水浒传》与《醉翁谈录》	205
三、《水浒传》与《大宋宣和遗事》	208
四、《水浒传》与《宋江三十六赞》	210
五、《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	214
六、《水浒传》与《北宋三遂平妖传》	220
七、《水浒传》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222
八、《水浒传》与《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232
九、高俅本东坡小史	244
十、花和尚鲁智深原来也有家室	247
十一、行者武松的多情及其人物原型	250
十二、豹子头林冲是一健仆小吏	254
十三、一丈青扈三娘的配偶究竟是谁	257
十四、杨志其人	260
十五、景阳岗之虎与沂岭之虎	262
十六、宋江潜入李师师家是事实	265
十七、擒方腊的究竟是谁？	267
十八、宋江也是词人	272
十九、宋江人物形像的原型裂变	273
二十、罗贯中、高则诚、陈文昭与《水浒传》	277
二十一、戏曲舞台上的林冲何以以剑代刀	281
二十二、清代中期花部中的“水游戏”	284
二十三、《水浒传》与鼓词	286
二十四、关于“八百里梁山水泊”	292

附篇 明、清评点派及其他

一、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刍议·····	303
二、金圣叹为什么不满意李卓吾? ·····	312
三、金圣叹对《水浒》悲剧结局的揭示·····	322
四、《读第五才子书法》释义·····	333
五、刘子壮与《宋元春秋序》·····	354
六、《水浒传》的对比艺术·····	357
七、林冲性格的“转变性”与“两面性”·····	366
八、《水浒传》是讽谏之作·····	370
后 记·····	375

上篇 《水浒传》与文化意识

《水浒传》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写宋江上梁山，坐了第二把交椅，紧接着，在第四十二回又写了他“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写他“遇九天玄女”，“得天之佑”，有了“终身佩受”的“天言”，即“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之后，晁盖一死，便改坐第一把交椅。这些，都体现了儒、道、释混合后的内容。自幼宗儒，又推崇佛、道两教，表现了宋江对“三教同源”的态度。这是《水浒传》思想文化意识的总揽。

——作者摘锦

一、从儒、道、释文化意识的流变概观谈起

《水浒传》的思想来源、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呢？作者在作品中如何贯彻爱憎和表现思想倾向性的呢？这就必然要涉及到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就从儒、道、释（佛）文化意识的流变概观谈起。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特别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变时期，各种思想便相继挤进了政治舞台并影响到社会生活。这个时期的封建思想，还不免带有从奴隶制社会脱胎出来的痕迹和因素，但显然，主流已是封建的东西占了上风并且取得了支配地位。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的思想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彼消此长，虽然出现了诸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类打击儒家思想的事例，但其思想支配地位的确定，却无可置疑。譬如，汉武帝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两千年来，基本上沿袭了这一点。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核心，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和人民生活中，几乎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优势（或趋势）和主流，表现了中国封建思想的主要倾向或方向，成为一种最大的传统势力即所谓保守力量。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思想体系。这种传统的思想体系，无疑，也是儒家所倡导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理想化了的精神支柱和理论信仰。这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其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有些作品虽然对于封建制度不合理的诸因素有所批判，但在主流上，仍逃

脱不了儒家思想，特别是正名观念和正统观念的思想范畴。也就是说，有些作品往往运用并改造了儒家的传统思想资料，并以此作为武器，展开了对封建儒家思想支配下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的批判，表示他是一个旧时代的“新”者，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儒家不是追求一种理想化的“大同”世界，寄希望于封建统治阶级，向望政治清明，实行“仁政”吗？可是，在封建社会里，却到处都是黑暗，到处都是暴政。这也就不能不是一些文学艺术家对儒家思想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便是处于改朝换代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反对的封建统治的最大限度，也只能是批判封建阶级的贪官污吏和暴虐政治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因素，而并不是想推翻整个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向望、所追求的，往往是一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归心”的统一国家和文明合理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政治“理想国”，也即儒家所标榜的“大一统”。

与儒家的封建思想对抗并结合的还有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这就是老（老子）、庄（庄子）学派（并且，发展成以后的道教宗派，如天师道的“三张”^①和“太平道”的张角^②等）。这个学派，也想设法地往封建的思想阵营里挤。当然，也曾一度为一些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与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一起，共同起到对人民群众进行统治的作用，从而构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成份中的特殊现象——儒、道、释三家溶汇结合的“三教合一”，从而进一步与中国封建政治发生联系，结合成一个整体，达到了政教合一。尽管儒、道、释三教在中国

① “三张”，系指天师道首领张陵（又作张道陵）、张衡、张鲁三代。他们是“五斗米道”的开创者。

② “太平道”是汉末黄巾军农民起义领袖张角所奉行的宗教，并有宗旨和口号。

的政治舞台上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为了各自的生存权利和切身利益，彼此之间进行一些斗争，但互相之间的影响，则是主要的，在统治人民这个共同的基点上，三教则是完全一致的，即许仲琳在《封神演义》中所说的“三教同源”。也就是说，在儒、道、释三种思想的溶汇和在现有政权中的彼此消长的斗争过程中，三教起到了共同的作用，都属于中国的传统思想（释家思想传入中国较早，已慢慢脱离了外来思想的痕迹，已忘记是舶来品。到元末明初，也似乎变成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了）。

道家思想，又称黄、老之学，或后期的“老、庄玄学”，就是因为据说它起源于黄帝和老子。而庄子又把老子的一些具有朴素辩证法方面的唯物主义因素来个头脚颠倒——向唯心主义方面恶性发展了。到了魏、晋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又进而与玄学合流，道家思想中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被一些道教徒们滥加发挥，而使之渐次泯灭，唯心主义的东西反而抬头，便逐步发展而成为道教。

东汉末年，老子被奉为教主，道家思想开始向道教演化。这时候，老子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主要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有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成份），被蒙上了一层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成为中国的三大宗教（区别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之一——道教。这种道教，与秦、汉以来流行的仙外方术等神仙家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加上汉末和魏、晋以来的谈玄风气，道教徒们乞求于一种长生不老的仙术仙药，便产生了炼丹与服石（“五石散”）的恶习，并自称有一种与“鬼神”打交道的法术，把古代巫师所搞的一套鬼把戏，也掺合进去了。老、庄哲学变成道教，成了一种宗教。这些道教徒们，确立礼拜仪式，伪撰道教经典——《太平清领书》（又名《太平经》），并编造说是由一个叫于

吉的人（道教徒）从“神仙”那里接受来的（这时的所谓“神仙”——骗子特别多，也特别盛行，仅宋代的《太平广记》一书中就列了这时期长长的一串神仙传的名单），用以蒙骗愚弄人民。

但是，任何一种思想形式，封建统治阶级可以利用，人民群众也可以利用。东汉的张角，就曾创立“太平道”，作为黄巾起义的号召和精神寄托。在此之前，属于天师道的张陵已创立了“五斗米道”，成为他的孙子张鲁占领汉中的政治理想。到了东晋，孙恩所领导的打击东晋王朝的士族门阀制度的农民起义，发展到十多万人，其中有不少属于“五斗米道”的天师教徒。于是，封建阶级便把这一派称为“邪教”（或“邪道”），以后关中豪族出身的寇谦之与葛洪要对道教进行改革，也要除去“三张伪法”，编造道经，扬言是“太上老君”（老子，又称李耳或老聃）授给的，还说“太上老君”亲口封他为“天师”，让他去辅佐“北方泰平真君”。为此，与拓跋焘的宠臣崔浩（也是“正教”的骗子）一兜一搭，大吹大擂，讲什么“治乱兴衰”、“圣王受命”，要助成魏太武帝的“文治”。以礼拜为主（类似于西方的耶稣教礼拜堂），以吃药、修炼为辅，这是寇谦之所创天师道（“正教”）的特色。魏太武帝还专门把寇谦之的学生从嵩山（寇谦之隐居的地方）接到平城，设立天师道场，亲自到道坛受符箓，表示受了天命。以后，每一个北魏皇帝即位，都要故技重演。自此以后，道教在北朝被奉为国教，受到了帝王的尊崇。

道教，说到底，还是魏、晋期间清谈玄学之风的继续和蔓延（当然，也有儒家的思想成份）。譬如，依附曹魏集团而遭到司马氏反对并为司马懿杀害的何晏，既是清谈家的祖师爷，又是服食“五石散”以求长生不老的鼻祖。服食散药这一恶习，一直沿袭到隋、唐。何晏不仅好老、庄哲学，并且著有《道

德论》、《易经》“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①，兼收儒、道两家思想。又如，“通辩能言”的王弼，就注解过《老子》（《道德经》），因用脑过度，加上服食“五石散”中毒，仅仅活了二十四岁^②。其他人诸如王衍、裴頠、郭象等玄学家们，所持思想，在本质上也属于道家的思想范畴，并且，已发展为与儒、佛合流，宗教神秘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晋代的那个“尤好神仙导养之法”的葛洪，继承祖上葛玄的遗业，搞“炼丹秘术”和籀纬之学，讲神仙方术^③。葛洪并在他所著《抱朴子》内篇中，拾遗儒家思想的牙慧，与寇谦之一样，诽谤诋毁那些倾向农民起义利用道教作掩护，反对封建暴政的汉末黄巾军的领袖张角等，说什么他们“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召集奸党，称合逆乱，不纯自伏其辜，或者残灭良人。”^④用道教中的“正教”攻击道教中的“邪教”，并在头脑里设计出了一幅道教改革的蓝图。在《抱朴子》内篇二十卷中，他专讲修道、炼丹、画符等神秘主义的东西；在《抱朴子》外篇五十卷中，则论述了政治、风俗、教化等等，闲而不闲，来了个“无为而无不为”，跃跃欲试，要帮助君主治理国家。岂知，这种颓废没落的思想，除了对医药方面有点研究价值外，是不足取的，早已被儒家思想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何况，道教的祖师爷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还有不少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不全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呢。而那个被封建的正统道教徒们作为“正教”的“天师”寇谦之，就曾不打自招地对崔浩自吹自擂：

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

①引自《三国志》卷九《曹爽传》附《何晏传》。

②《三国志》案二八《钟会传》记载《王弼传》。

③《晋书》卷七二《葛洪传》。

④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九《道意篇》。

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闇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①。

于是，崔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天地之形成，下尽秦、汉变弊之流迹。寇谦之要“兼修儒教”，与要改革道教的葛洪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更好地愚弄麻醉人民，力图消除人民利用道教举旗造反的危险。显然，这系道教中的一股逆流。这种逆流，进而发展成为以后的方术之士或骗子哲学，不但愚弄人民，甚至连皇帝这些封建阶级的最高统治者，也不能幸免。秦始皇提倡法制，但他却派徐福去海上求长生不老之方；而接受了儒教的汉武帝，在利用董仲舒这个大儒所提倡的“天人感应”学说时，也搞什么金人玉盘，追求长生不老；甚至连那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能搞出一个“贞观之治”来，却免不了相信“长生不老”的“仙方”；张果老也曾骗过了大周则天皇帝武曌和“开元之治”的唐玄宗李隆基^②，更不用说那些亡国之君如宋徽宗赵佶之流了；……道教徒们所编造的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在明初宫廷中也时有表现，甚至连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功臣刘基的功成志满，没能够急流勇退而遭杀身之祸，也被附会成得道成仙呢。且不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谈玄风气和服食“五石散”等恶习与道教有关，即便是象酒仙李太白怎样呢？他的“海里捞月回天宫”^③，不是上了道家思想的当吗？……这些文治武功的君相和贤良学士们都受道家的欺骗。但

①《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②传说八仙中的张果老，在武周、唐玄宗时代，曾多次混入宫廷，用“仙术”骗过了一些人，并得到“真人”的称号。

③李白失足落水后便附会为“海里捞月回天宫”的神话故事：说李白是太白金星降世转生，一生潦倒，阳寿已尽，需要归位。一日晚间酒醉，水边徘徊，看到月亮映到水里的影子，误认为是月亮落水，便跃入水中，水中跃出一金尾红鳍鲤鱼，化作飞龙，刹时风雨大作，天鼓作响，飞龙驮着李白飞往天宫，回归太白金星位去了。这则故事，大概系根据李白的“神仙家”思想附会出来的。

是，道家思想也有合理的内核。譬如，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中就不泛辩证法的因素。这正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辩证法是头脚颠倒一样，如果翻转过来，《老子》一书中，我们透过唯心主义（有的把“道”作为一种原始的物质看待，由此得出系唯物主义的结论）的外壳，便会发现不少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即便是到了战国时代邹衍的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虽然有儒、道之辨，但这五种物质，也可以解释作唯物主义的。因此，有些道家思想如葛洪所阐述过的唯心主义的道家教义，便遭到了象鲍敬言一类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们的攻击。鲍敬言本人信奉道家思想，“好老、庄之书”，但他提出了“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理论，虽然矛头指向了“天生蒸民，而树之君”的儒家教义，但他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葛洪的合儒、道中唯心主义糟粕而发的。所以，他的理论，便理所当然地与葛洪等人的思想相对立。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卷四八中写下了《诘鲍》一篇言论，极尽善言诡辩之能事。也正因为鲍敬言的道教思想表现了无视君主的离经叛道和反封建主义思想，所以，就受到被压迫人民的拥护，并发展成农民的理想、寄托和起义的理论根据。而老子作为道家始祖，他于《老子》一书中也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这俨然是儒家思想了。

其实，以上所说，道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历代农民起义都十分崇尚并加以利用，以此对付儒教中德威兼济中的“威”上，即所谓暴政思想，和反对“戎夷之教”的佛教，以潜在一种民族意识。譬如，唐朝的黄巢号“冲天大将军”，就是以道教造儒与佛的反。而宋朝的方腊以及那些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外来侵略者的秘密结社组织，都是运用了道教中的资料或口号作为号召呢。不过，他们是用道家的思想武器来反对道家的思想

糟粕罢了。但也谈不上有多少所谓“新”的思想因素，最多仍不过是与儒家和佛家思想中的先进成份的混和体罢了。明人许仲琳在《封神演义》中写殷纣王将失江山，周文王将出，就把姬昌周文王所在的王国西岐说成“上天垂象”、“凤鸣岐山”、王者将兴，意思是周将代殷；而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写了一个“六月”飞雪的不良征兆，影射元朝统治下的冤狱遍地，人民将起……这种诉诸于天变的理想化，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无出路的情况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解脱或寄托。故尔，仍属于道家的思想范畴。

于儒、道两家思想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里，还有东汉由外国（印度）传来的释家思想，并也挤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和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与儒、道合流，共同加强封建的专制统治，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成份中的特殊现象——儒、道、释“三教合一”，从而进一步与中国封建政治和政权发生联系，结合成一个整体，达到了“政教合一”。尽管，为了各自本身的生存权利和利益，三教之间彼此进行过一些斗争，但互相之间的影响和联系，则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在统治人民这个共同的基点上，三教是一致的。

佛家，又称释家，系东汉由印度传来中国。不久，即与中国的儒和道的传统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儒、道、释三教合一。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左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以至整个社会。尽管这三教也有互相斗争的彼消此长的情况，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当然，也有唯物主义的成份）。所以，都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看中，共同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精神工具或思想武器。佛家的因果报应、循环论、命定论、天命论思想等，在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和教义中，都能找得出来。无疑，这些东西，都是欺骗人民，愚弄人民的精神鸦片，属于封建性的糟粕。所

以，便引起不少人群起而攻之。

我们知道，佛教在中国初传阶段，常借助于咒法巫术，依附当时流行的方士，以取得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信奉。以后，安世高等人，开始翻译佛经，佛法教义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开始是小乘经典，嗣后不久，支谶、竺法护即兼译大乘经典，并使之在中国占了优势。最初输入的佛教思想，倡导“万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认为人们时刻处于生灭轮回的过程中，且受制于生前及本世的种种痛苦活动所造成的因果关系，人们对于自己的命运，既无法预知，又不可摆脱，永远处于无限的烦恼与痛苦之中。由此，劝诫人们抛弃尘世，追求一种清静、安然的“涅槃”，即虚拟的理想化了的境界。后来，大乘《方等》、《般若》诸经典流行，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空无的，连因果、轮回也只是一种概念的外壳，并非实有，没有自“我”，当然，也就不存在对痛苦和苦恼的解脱了。后来，《法华》、《涅槃》诸经流传又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甚至连强盗只要“放下屠刀”，也可以“立地成佛”，并倡言佛的宗旨是救苦救难，超度众生，追求“未来世界”。这种教理，在干戈扰攘的乱世，使人们把理想寄托来世，当然，也就忘记了现实的痛苦，消除了反抗意识。因此，一下子被封建统治阶级所看中。对此，南北朝时候刘宋王朝的何尚之道出了真谛：

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错；雅颂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指宋文帝刘义隆）所谓坐致太平者也①……

由于封建帝王的大力提倡，以此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以致使

①《弘明集》卷一一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法事。